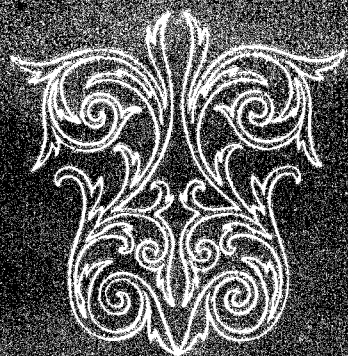


中國古代的類書



中華書局

中国古代的类书

胡道静 著

1371.101



中华书局

1982年·北京

中国古代的类书

胡道静 著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5¹/₄印张·116千字

1982年2月第1版 1982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0,400册

统一书号: 10018·485 定价: 0.60元

出版说明

《中国古代的类书》是胡道静先生的旧作，原稿的下半部已于十年动乱中损失。作者目前正致力于《梦溪笔谈补证》的重写工作，一时没有余力重新补写本书。我们考虑到本书分别介绍各个时代的类书，每个章节有相对的独立性，特商得作者同意，先把这一部分出版，以飨读者。待作者写成补稿时，再出续编。

中华书局编辑部

一九八一年一月

藝文類聚卷第八

山部下 虎丘山

蒜山

石帆山

石鼓山

石門山

歐陽

詢

撰

太平山

岷山

會稽諸山

交廣諸山

水部下 葱嶺水

海水

河水

江水

淮水

淇水

洛水

虎丘山

虎丘山銘曰晉司徒東亭獻公王珣撰云武丘山先名海涌山 吳越春秋曰闔廬死葬於國西北名虎丘亭去為川積壤為丘發五都之士十萬人共治千里使象埴土冢池四周水深丈餘擲三重傾水銀為池池廣六十步黃金珠玉為鳥鴈屬諸之劍魚三千腸在焉葬之邑三日金精上揚為白虎據墳故曰虎丘 王珣虎丘記曰山大勢西周四嶺南則是山逕兩面壁立交林上合踐路下通并降窈窕亦不卒至

張正見從水陽王遊虎丘山詩曰滄波壯鬱嶺島洛邑鎮東示其不若茲山巖崿峻擅水鄉地靈侔少室空艱像太行重巖摺虎踞九曲峻羊腸瀾深關無底風幽谷自涼寶氣沈餘玉氣劍隱壁星光白雲多

《藝文類聚》

南宋紹興間嚴州地區刻本

太平御覽卷第一

翰學士袁直奉天守節書者新語程國器照開國伯魯言歸紫衣袁長李學平

勅暴

晉陽院

天部一

元氣

太易

太初

太始

太素

太極

天部上

元氣

三五曆紀曰未有天地之時混沌狀如雞子溟滓始牙濛

莫孔鴻淵孔滋萌歲在攝提元氣肇始又曰清輕者上為

天濁重者下為地冲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河圖曰元氣闡音陽為天

又曰元氣無形洶洶蒙蒙偃者為地伏者為天也

禮統曰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所自焉

冊府元龜卷第九百一

總錄部 百五十一

公直

直

服義

公直

滅私之謂公正曲之謂直君子之懿德也自上古之世移至公之道廢則情勝於理恩克於義心由利易政以勢遷自非時獻中庸好是正直執不回之道守無頗之性則焉能獻替可否不以讎而掩賢聞實憲章不以親而害法臨事盡節外顧於其孥當官而行罔避於權右刑奏列而無隱斥問遺而不通故能成剛毅之風全忠信之行先聖所以嘉歎良史所以攸書宜乎為後世之懿範也

史魚為衛大夫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無道行直如矢言不曲

叔向為晉大夫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

卷九百一

目次

第一章 类书的性质、起源及类型

- (一) 类书在古典目录学中的位置……………1
- (二) 类书的起源和远源……………5
- (三) 类书的范围和各种类型……………8

第二章 类书的作用、反作用和特殊作用

- (一) 类书的本来作用及其流弊……………15
- (二) 类书的第一特殊作用……………22
- (三) 类书的第二特殊作用……………35

第三章 曹魏和南北朝的重要类书

- (一) 《皇览》……………40
- (二) 《寿光书苑》……………43
- (三) 《类苑》……………44
- (四) 《华林遍略》……………45
- (五) 《玄洲苑御览》——《圣寿堂御览》
——《修文殿御览》……………47
- (六) 《珮玉集》……………55

第四章 隋代的重要类书

- (一) 《长洲玉镜》……………58
- (二) 《编珠》……………59
- (三) 《北堂书钞》……………64

第五章 唐代的重要类书

- (一) 《艺文类聚》……………77

- (二) 《文思博要》; 《三教珠英》——《海内珠英》84
- (三) 《兔园策府》; 《类林》; 《增广分门类林杂说》87
- (四) 《初学记》.....94
- (五) 《白氏六帖事类集》; 《白氏六帖事类添注出经》;
《孔氏六帖》; 《唐宋白孔六帖》; 《六帖补》.....102
- (六) 《稽瑞》.....114

第六章 北宋的重要类书

- (一) 《太平总类》——《太平御览》.....117
- (二) 《历代君臣事迹》——《册府元龟》.....133
- (三) 《一字题赋》——《事类赋》.....147
- (四) 《重广会史》.....151

后记154

第一章

类书的性质、起源及类型

在我们清理祖国古代文化、研究古代历史的工作中，经常会运用到古代的类书，从其中搜集有关的资料。因为它们总是把历史文献上的各种资料，分类汇辑在一起。因此，类书具有“资料汇编”的性质，是很明显的。

类书辑录的资料，一般都不是单门、单类的专题性质的，而是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知识的，所谓“区分臚列，靡所不载”《玉海》李昉序语；“凡在六合之内，巨细毕举”陈梦雷《上诚亲王汇编启》语者。所以，十分接近于现代的“百科全书”。当然，它们只是封建社会体系的百科全书。而且，现代百科全书的每一词目，总是编写成文，不是专门把有关的原材料辑录在一处；中国古代的类书的编辑方法则一般地与此相反。因此，构成了类书性质的特点——兼“百科全书”与“资料汇编”两者而有之。也正因为这样，从今天看来，古类书不仅可以作为了解古代知识全貌的一种工具，而且也是古代文献资料的渊藪。

（一）类书在古典目录学中的位置

谈谈类书在我国古典目录学中所处的位置，主要是借此以明确类书的性质，同时也说明它们在古典目录学中的部位及其变革。

我国的古籍，自晋、隋以来，按“四部”分类——经、史、子、集，每一部代表一个大的门类。类书和丛书，实际上都综赅四部的书，

是哪一部也容纳不了的。但习惯上总是把这两类书籍，特别是类书一类，放在子部里。例如，清末张之洞撰《书目答问》，把丛书独立成一部，和四部相并而成为五部；但是，类书还是放在子部里。不过，在类目下附了一个注说：“类书实非子，从旧例附列于此。”^①因为传统上有一种看法，认为子部的内容是可以综括群类的，好象我们今天的“总类”一样。这种看法，是由于子部里有“杂家”一类，而“杂家”本是“无所不包”的。所以，当类书在古典目录学里还没有被独立安置一类时，是附处在杂家类里的。《隋书·经籍志》著录类书性质的书十多部于子部·杂家类的末尾，是作为杂家的附庸或杂家的一支看待的。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的意见，《隋志》的杂家类实包容四支：(1)诸子之属，(2)杂家之不名一体者，(3)类事之属，(4)释家之属。《隋志》上虽未标明这些属名，但从书籍的排列次序上看，界线是很清楚的，没有以此入彼的混乱。

在《隋志》以前，晋·荀勖编《中经新簿》，那时类书方诞生不久，尚只有始祖《皇览》一部。但是，这唯一的份量巨大、性质特殊的书籍已引起了注意。据《隋志·序》说：“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三曰景部，按，“景部”即“丙部”，因唐高祖之父名昝避讳改；又，其时史部为丙部，子部为乙部，及东晋著作郎李充“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于是史部居乙，子部居丙。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这样，荀《簿》是以《皇览》入史部。但“皇览簿”只能有孤零零的一部书，何以与“史记”、“旧事”等并列一类是一疑问；其何以在史部，是又一疑问。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举《中经新簿》有不可解者三，其一是：“《皇览》何以与《史记》并列？”(页72)。所以，《隋志》对此作了处置，

^① 撰《书目答问笺补》的江人度曾上书于张之洞论目录学的配隶问题，其间对此亦提出了意见，他说：“《隋志》以类书入子部。考诸子之学，儒、墨未碍于并立，名、法亦有所取材，宗旨各殊，不嫌偏宕，畦径独辟，别具精深，所谓自成一家言也。类书者，香馊经、史，渔猎子、集，联百衲以为衣，供獭祭于枵腹。岂可杂厕丙籍，混迹子家？[原注]中堂原注亦有‘类书实非子’之语。”

将类书移至子部,附在杂家类的后面。

类书独立成类 类书在子部里独辟成为一类,是始于唐开元时毋煚编《古今书录》。《古今书录》已佚,但五代·刘昫《唐书·经籍志》是循《古今书录》辑成的。在《唐书·经籍志》里,丙部子录有十七家,其第十五家为“类事家”。类书于是脱出了杂家类而独自成为一类。

这个变革的重要意义是:(1)认识到类书和杂家书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2)显示类书已更加增加,蔚为大国,既有必要且有可能独自成为一类。明·焦竑《国史经籍志》类家的《小叙》说:“前史有杂家,无类书。近代纂述丛杂,乃为别出。要之,杂家出自一人,类书兼总诸籍,自不容濶也。”大体上说出了这两项重要意义。

这个变革的重要影响是:类书从此独占一类,不为附庸,已无异议。由《新唐书·艺文志》以下,到清乾隆中的《四库全书总目》,到近、现代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中国丛书综录·子目分类目录》、《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等都是如此:隶之于子部而为独立之一类。只是类的名称异于《唐书·经籍志》:《新唐志》称“类书类”,《宋史·艺文志》称“类事类”,《国史经籍志》称“类家”,《中国丛书综录》称“典故类”,而以“类书”夷为属名;然绝大多数是照《新唐志》称“类书类”,包括《四库全书总目》和《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等。

主张类书由类升部 南宋初年,莆田郑樵撰《通志·艺文略》,他的分类法打破了“四部法”,以古今书籍分为十二大类:经类第一,礼类第二,乐类第三,小学类第四,史类第五,诸子类第六,天文类第七,五行类第八,艺术类第九,医方类第十,类书类第十一,文类第十二。于是类书类不为诸子类的隶属,而与诸子类相并,意味着类书类升级为部级。其后,南宋端平中,樵之族孙郑寅“以所藏书为七录:曰经、曰史、曰子、曰艺、曰方技、曰文、曰类”。见《直斋书录解

题》五十六卷本卷 25、二十二卷本卷 8。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称寅所立七类“在分类学中，颇近合理。……类书包含一切，更不宜屈居子末。今郑寅能拔艺、技、类与四部抗颜行，真可谓目光如炬矣”。页 114。

明正德时陆深撰《江东藏书目》，嘉靖中晁琛、孙楼各撰《宝文堂书目》和《博雅堂藏书目录》，万历中张萱撰《内阁书目》，清嘉庆时孙星衍撰《孙氏祠堂书目》等，都把类书和诸子并列，处于抗衡而非从属的地位。

这样做法，都是发见了类书的内容是包举四部的百科全书性质，因而觉得它们不应当隶属于四部中之一部。明嘉靖时胡应麟、万历时祁承燾在这个问题上，都有明确的意见提出：

类书，郑《志》另录；《通考》仍列子家，盖不欲四部之外别立门户也。然书有数种：如《初学》、《艺文》兼载诗词，则近于集；《御览》、《元龟》事实咸备，则邻于史；《通典》、《通志》声韵礼仪之属，又一、二间涉于经：专以属之子部，恐亦未安。余欲别录二《藏》及贗古书及类书为一部，附于四大部之末，尚俟博雅者商焉。（《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九流绪论》下）

夫类书之收于子也，不知其何故？岂以包宇宙而罗万有乎？然而类固不可以概言也：如《山堂考索》，六经之原委，纤备详明，是类而经者也；杜氏《通典》、马氏《通考》、郑氏《通志》，历朝令甲，古今典故，实在于此，是类而史者也；又如《艺文类聚》之备载词赋，《合璧事类》之详引诗文，是皆类而集矣。余谓宜另附四部之后。（《澹生堂藏书记·藏书训略·鉴书》）

事实上，不仅这一或那一类书近经、近史、近集，而是这些类书每种都包罗万有、赅括四部。故议以类书自居一部，与四部相并，是有理由的。不过在历来古典目录学的实际使用上，还是类书类隶子部的占优势。这个事实情况，是应当照顾的；可是在理论上，我们

也应当支持类书自居一部的主张，因为这个理论能够更彰明地揭示类书的性质。

《四库全书总目》虽仍旧贯而把类书类放在子部里，但它也明确类书实非四部的任何一部所可收容的，它在类书类的《小叙》中是有所交代的：

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皇览》始于魏文，……《隋志》载入子部，当有所受之。历代相承，莫之或易。明·胡应麟作《笔丛》，始议改入集部，然无所取义，徒事纷更，则不如仍旧贯矣。

但是它说胡应麟“始议改入集部”，是错误的。胡是主张独立一部，“附于四大部之末”；而实行独立为一部者，也早已有之。《四库》是惮于改变，知而不能行，才仍旧贯罢了。

（二）类书的起源和远源

明确了是怎样一种性质的书称为类书，才好确定类书的起源是什么书。

如前所述，我国古代类书是“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的综合体。另外还要加上一条，就是它们的形式是区分门类的。“类书”的名称，本是由此得来。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易·系辞传》语；“事类相从，聚之义也”皇甫谧《甲乙经·序》语者是。

区分门类是为了便于查检，便于按图索骥。后来发明了临事求检的更便捷的编排方式，就是采用“字典式的”依韵编录的方法。这种类书，已消失了分类的形式，但是不因此而影响到它们的百科性质和资料辑辑的实质，并且依韵编录也是由便于查检的分类方式衍生的、发展的，所以这种没有分类形式的类书仍然是类书。

《皇览》是类书的始祖 魏文帝曹丕在延康元年到黄初三年间

[220—222]召集群儒编成了一部在当时书籍体制上是完全新型的书——《皇览》。这书的性质和形式完全符合于上述的条款，所以它是古类书的始祖。宋·王应麟《玉海》说“类事之书，始于《皇览》”《玉海》卷54《承诏撰述》和《类书》篇；明·焦竑《国史经籍志》说：“流览贵乎博，患其不精；强记贵乎要，患其不备；古昔所专，必凭简策，综贯群典，约为成书，此类家所由起也；自魏《皇览》而下，莫不代集儒硕，开局编摩；乃私家所成，亦复猥众；大都包络今古，原本始终，类聚胪列之，而百世可知也；韩愈氏所称‘钩玄提要’者，其谓斯乎！”《国史经籍志》卷4下·类家·小序。这些说法都是对的。

由于《皇览》到赵宋时代已亡佚，学者不及见，乃以为类书起于齐、梁间，如衢州本《郡斋读书志》卷14《同姓名录》条下说：“齐、梁间士大夫之俗，喜徵事以为其学浅深之候，梁武帝与沈约徵栗事是也。类书之起，当在是时。”袁州本卷3下《同姓名录》的解题里没有这几句话，或者是发现不对而删去了。这个把创始时间推迟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杂家乃类书托始说 另有一种说法，是把类书的开端推得早早的，认为战国季年的杂家著作，即类书之所托始。倡其说者为清代中期的学者汪中。《述学·补遗·〈吕氏春秋〉序》^①说：

司马迁谓不韦使其客人人著所闻，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然则是书之成，不出于一人之手，故不名一家之学，而为·后·世·《·修·文·御·览·》、《·华·林·遍·略·》·之·所·托·始。《艺文志》列之杂家，良有以也。

接着，以辑佚名家的历城马国翰推广此意，也在其《玉函山房文集》卷3的《〈锱珠囊〉序》中说：

^① 题下原注云：“代毕尚书作。”即代毕沅作的。但《吕氏春秋新校正》前面的毕氏自序，并不是这一篇，不过确实吸收了汪中的许多看法写在里面，可信是以汪文为蓝本而改写的。然而汪氏那句大胆设想的“而为后世《修文御览》、《华林遍略》之所托始”的话，毕氏并没有敢采用。

类书之源，开于秦，衍于汉。余观《吕氏春秋》，《十二纪》取诸《月令》，《至味篇》取伊尹书，《当染篇》取墨子书，《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述后稷之言，与《亢仓子》所载略同。而取黄帝、老子、文子、子华子之说，不一而足。意盖以周《月令》为纪，杂采百家分属之。此类书之最先者也。

《淮南鸿烈》实仿《吕览》为之，书中采文子语几尽；其它大抵皆有所本。刘向《洪范五行传记》及《新序》、《说苑》，率取古说，分类条列，皆类书也。

乃《唐书·艺文志》别列类书一目，托始于何承天、徐爰并合之《皇览》。考《魏志·刘劭传》：“黄初中，受诏集群书，号《皇览》。”岂《志》以《吕览》、《淮南》及中垒之书所征引不可复见，而据《魏志》为断欤？

马氏在辑佚实践中与类书的交道打得透熟，所以这些是他的深刻体会之语。当然也应看到，诸子各有其宗旨，纵使为杂家言，“兼儒、墨之道，通众家之意”，依然有其中心，如《吕览》之宗于儒，《淮南》之归于道；并且绝不是专以资料为标榜。因此，与“肴饌经、史，渔猎子、集，联百衲以为衣，供獭祭于枵腹”的类书毕竟有别。故视杂家言的《吕览》为类书的“远源”则可^①，竟谓类书始于《吕览》则不可。这也就是“杂家”和“类书”之间的一条分界线。当然，它们之间有通气孔，故古典目录学的著录中，开始时是把类书附列于杂家类中——为何不列于它类而要置于杂家，便是一个可以玩味的问题。明乎此，一些古籍间的脉络、关节，可以“思过半”了。

《尔雅》为分类书籍之所昉 由于类书是明标类目，分别部居的，所以也要追溯分类书籍的起源。今人张舜徽反对马国翰的说法，而以为《尔雅》应是类书之所起。他在《清人文集别录》卷15

^① 这也好象有的学者认为《管子》和大、小戴《礼记》是“丛书”的远源一样。但真要指出“丛书”的始祖，还是要举《儒学警悟》和《百川学海》。

中说：

国翰此言，乃由乎不明古书体例而致谬戾耳。夫诸子百家，以立言为宗，例多援据旧语，以明欲宣之义。“《诗》云”，“《书》曰”，见之《论语》、《孟子》者，亦已多矣，安得悉谓为类书耶？

类书之起，昉于明分部类、据物标目，盖必推《尔雅》为最先。此说有其“类书远源论”的一部分道理，而驳议为未当。因马国翰不说“一切诸子”的“援据旧语”，而是说兼综诸家的“杂家”援据旧语。本来嘛，杂家之兼综，类书之集裘，就是构成了它们的血缘关系。至于类书的分类形式，应推源于《尔雅》，则也是类书的“远源”之一。然就性质来说，《尔雅》为文字训诂之书；类书虽亦收录字书，但毕竟不能把类书作为字书来看待。

所以，推类书的远源，可以及于分类标目的《尔雅》和兼综众家的《吕览》，而不能视《尔雅》、《吕览》即为类书。类书之起，自要到曹魏初年《皇览》问世后才有此一体。至于把类书出现的时间降至齐、梁，则又为数典忘祖。

（三）类书的范围和各种类型

我们现在所说的“类书”，就是指这种兼“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性质的古籍。正宗的“类书”，也就是这种性质的古籍。类书的始祖《皇览》完全具有这种性质，所以它是正宗的类书，也是标准的类书。因为作为“类书”这一体裁的书是取此做衡量的标准的。但是，在古今的古典文献著录中，“类书”一类的包容范围却不一律，当然，正宗的类书一定照收在内，可是其它门类的书籍也往往阑入，象姓氏书、政书，有时甚至是考证笔记、目录书都会列在类书类里。这些，我们就不能认它们为是类书，至少有些不是正宗的类书。而正宗的类书，从各种角度来分析，也确是各有不同的类型。